

〔唐〕杜甫 著 葛景春 注评

杜甫诗选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唐]杜甫 著

杜甫诗

葛景春 注评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诗选/(唐)杜甫著;葛景春注评.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348-3596-4

I. ①杜… II. ①杜…②葛… III. ①杜诗-诗集
IV. 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0321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1.5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杜甫诗选

前言

—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字子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正月初一，出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东二里的南瑶湾。他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文化世家。他的十三世祖晋代镇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是一位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儒将，对儒家的史学经典《左传》十分爱好，史称有《左传》癖，曾撰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他的曾祖杜依艺，曾任巩县令。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为当时“文章四友”之一，官至膳部员外郎。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受其先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影响很大，从小就受到儒学的熏陶和作诗的训练，立志继承先祖和祖父的“素业”，作为儒学大师和著名诗人的传人，他具有仁者的胸怀和诗人的气质。

开元时到天宝初年，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杜甫自幼聪颖，“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杜甫幼年丧母，被寄养在洛阳仁风里二姑母家。他少年老成，苦读诗书，所从游皆当时名士，如李邕、王翰、崔尚、魏启心等。十九岁时，曾漫游郾瑕（今山西猗氏）。二十岁后，又漫游吴

越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曾回洛阳参加过一次进士考试，未中。开元二十四年赴东鲁探亲，并开始齐赵之游。此时的杜甫也与盛唐时的诗人一样，胸怀稷契之志，怀着浪漫的理想，想“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立志于建功报国，一展鸿图。开元二十九年，杜甫回洛阳首阳山下陆浑庄祖茔，筑土室，作祭文《祭远祖当阳君》，约在此时与杨氏结婚。约在天宝元年（742），其父杜闲卒，杜甫在祖茔为父亲守墓。天宝三载，他与李白在洛阳相会，又与高适一起游梁宋，登吹台，慷慨怀古。后来又与李白客游齐鲁，过了一段“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快活日子，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兄弟友谊，天宝四载秋，在兖州（今属山东）泗水边二人分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面。当时的杜甫，是一个胸怀远大理想、能骑马射箭的青年壮士。但那时的大唐帝国已不再是开元盛世的鼎盛时代了，唐玄宗也不再是开元前期的有为帝王，而成了一个沉湎于声色犬马、开边黩武的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此时开元时期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臣良相都相继去世或被排挤出了朝廷，而代之以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徒。

天宝五载后的长安十年，是杜甫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天宝六载杜甫参加了长安的制举考试，结果无一人中第。李林甫表贺“野无遗贤”。杜甫在长安无依无靠，生活拮据，“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投简成华两县诸子》），只好“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奔走干谒，过着“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困苦生活。天宝九载杜甫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欣赏，命待制集贤院，等待授官。但直到天宝十四载才得到一个河西尉的小官，杜甫不就，于是又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得官后不久，杜甫就回奉先县省亲，其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在长安十年，长期生活在社会下层并奔走于权贵之间，对民间的疾苦和朝廷内部的黑暗及达

官权贵的腐朽堕落都有较深刻的了解，对大唐由充满希望到逐渐失望，他也由对盛世的理想主义的向往，逐渐转向了现实主义的观照。他在天宝末年，就写出了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者生活荒淫和穷兵黩武的诗，如《丽人行》、《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示出了盛唐社会在表面繁荣下却深藏社会危机，显示了他卓越的眼光，并表达出他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及百姓命运的深切关注和隐忧。

从天宝十四载末到乾元二年（759）七月的安史之乱初期，是杜甫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这是他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刻，杜甫的思想迅速地成熟了，国家命运和人民的苦难成了他关注的中心，忧国忧民从此是他思想的主调。他的诗歌也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一大批反映社会现实的闪耀着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光辉的优秀诗歌在他的笔下诞生了。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携杨贵妃等逃出长安，至马嵬驿，将士哗变，杀死杨国忠，逼玄宗缢死杨贵妃，玄宗南奔巴蜀，太子李亨留关中讨贼，安史叛军攻占长安。至德元载（756）八月，唐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属宁夏），杜甫闻此消息，便从羌村出发，间道延州（今陕西延安），欲投奔灵武，半道被叛军俘获，押至长安。在长安陷贼期间，杜甫作《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春望》等诗。至德二载五月，杜甫从长安逃奔至肃宗行在所凤翔（今属陕西），“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肃宗感其忠诚，授左拾遗。房琯因率兵却敌失利，肃宗欲治重罪，杜甫冒死疏救，被认为是房琯同党，墨制杜甫归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杜甫作《北征》。他从此被肃宗疏远。乾元元年六月，房琯被贬邠州刺史，杜甫亦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其年冬末，杜甫以事回东都偃师（今属河南）陆浑庄，在由东都返回华州的路上，所作的“三吏”、“三别”以及《洗兵马》等诗，被萧涤非先生誉为“他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光辉的顶点，是他那

种‘穷年忧黎元’的进步思想和‘毫发无遗憾’的艺术要求的高度结合的典范”（《杜甫诗选注》前言）。

乾元二年七月，杜甫由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弃官西走，由秦州（今甘肃天水）入蜀开始了他人生的第四个阶段。在秦州住了三个月，十月离秦州赴同谷（今甘肃成县），十二月一日，又离同谷赴成都。此期间作了《秦州杂诗二十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以及由陇入蜀的纪行诗二十五首等一百多首诗，记录了他逃难生涯的艰辛历程。此时他已不再是一个朝廷的命官，而成了一个战乱时期逃难的难民，跌入了社会的底层。他一路上心感身受，亲身体会到了下层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饥寒交迫、生死流离之苦。从乾元三年至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在成都、绵州（今四川绵阳）、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地，共度过了五个年头。在成都时曾依附严武，除了做过短时期的幕僚，并由严武上奏，得一个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虚衔之外，他主要是依靠亲朋的接济和自己种药、卖药维持生活，挣扎在贫困的生活线上。如果说在写“三吏”、“三别”时，他还是以人民群众之上的官员身份来观察和同情百姓的苦难，那么在此时他却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来对苦难的现实生活进行亲身体验。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不再是一种理性的概念，而是一种生命的切身体验，因此他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发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愿望，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发自诗人内心的真诚呼喊。在成都时期，他暂时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因而也从审美的角度写了一些描写当地民风民俗和蜀地风光的优美诗篇，扩展了诗歌审美的意境和天地。但好景不长，由于他的好友严武已死，他在蜀中生活失去了依恃，便打算东出三峡，寻找新的生活出路。

从永泰元年四月，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泸州（今属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云安（今重庆云阳），东赴三峡，永泰二年暮春至夔州（今重庆奉节），住了近二年，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五个阶段。这个时期是他对历史和人生的回顾总结的阶段。他对大唐历史的经验教训，对自己一生诗歌创作的心得和经验，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回顾和反思，尤其是对律诗的创作，作了细密深入的探索，写了《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七律联章杰作和一大批如《阁夜》、《又呈吴郎》、《登高》等七律名作。此段时期，他创作诗歌十分勤奋，在夔州约作诗437首，约占其诗歌创作的三分之一。同时，由于他与当地的百姓生活更加贴近，因此他对民生疾苦更加关心，尤其是对封建社会的弱势群体——下层劳动妇女十分关心。他对夔州的负薪女和无夫无儿的寡妇等给予极大的同情，并为她们做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表现出一个仁者博大的爱心。

大历三年（768）正月中旬之后的湖湘漂泊时期，是他人生的第六个阶段，也是杜甫最后的人生阶段。此时他已是一个“右臂偏枯半耳聋”的垂暮老人，但他仍时时挂心国事，关注人民。他虽然衣食不继，过着“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逃难》）的贫困潦倒、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却对“天寒网罟冻”的无以为生的渔民，“杼轴茅茨空”、“处处鬻男女”（《岁晏行》）的走投无路的农民十分关心，对“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时局和国运十分忧虑。大历五年冬，他怀着尽快地结束战乱、复兴大唐太平盛世“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和“男谷女丝行复歌”的美好愿望，死在了一条由长沙至岳阳的船上。

杜甫生活在大唐由极盛而转衰、由太平而战乱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他由一个官宦子弟和一个朝廷官吏一步步地走近了人民，由一个理想主义者逐渐转变成了一个直面社

会人生的现实主义者和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是时代玉成了他，也是诗人的努力不断地提升他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境界，完成了由普通诗人向一个伟大诗人的转变。如果说盛唐社会是由前期的盛世和后期的衰世两部分组成的话，那么李白的诗歌主要是反映和表达了唐人在盛世时期着重于个人抱负实现和个体人格展现的理想主义精神，杜甫诗中则着重反映和表达的是在后期的衰世和安史之乱后的乱世中，唐人要重塑群体人格、将君臣民融为一体、直面社会和人生、齐心协力复兴国家和民族的群体愿望及关注社会和民生的忧世情怀。李、杜二人各反映了盛唐的一个侧面，他们二人的诗歌合起来所表现的才是一个完整的盛唐。而杜甫所展现的现实世界与内心世界比李白更加宽广，内容更为深刻。而且唐代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在走下坡路，再也没有盛唐那样的盛世出现，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下层百姓的苦难遭遇时时成为衰世和乱世人们所关注的中心，这就是杜甫更能为后世人们所接受的原因，也是杜甫诗作更具有深邃的民族文化内涵的缘故。

二

儒家思想是杜甫的主导思想。忧患意识是儒家的思想传统之一，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万章》）杜甫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深厚的儒家忧患意识。其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忧国和忧民，“少陵有句皆忧国”，的确如此。“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表现出杜甫忧心社稷的爱国主义精神。安禄山叛乱，实质上是一场民族分裂势力分裂大唐国家的民族矛盾和落后的经济文化破坏先进经济文化的历史前进与倒退的矛盾。杜甫对安史之乱有着强烈的仇恨：“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他迫切希望能够“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北征》）。这里，他是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国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宋人

说杜甫“一饭未忘君”，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杜甫并不是一个愚忠之人，他所要忠的君是尧舜一样的圣君、明君，而不是昏君、庸君。如像唐太宗这样的君主，就是他心目中明君的榜样：“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而像唐玄宗这样的皇帝，他就一分为二了。他对唐玄宗前期的开元之治充满了追忆和向往：“忆昔开元全盛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忆昔》）而对唐玄宗晚年昏愤、沉湎酒色、穷兵黩武的行为，则给予尖锐的讽刺和批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对于宠信朝中奸佞小人而一味排挤异己的唐肃宗，他则冒死进谏，如他疏救房琯，就是以死谏诤的。他对肃宗为皇后张良娣及李辅国等群小所挟持，则加以讽刺：“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唐尧虽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有这种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集团和封建皇帝的批判意识，能说他是愚忠吗？至于他直接批评官军和官府残民、扰民和过度搜刮剥削人民的言论，正是站在维护国家和百姓利益的立场上来揭露批判那些贪污腐败的丑恶现象和不正之风的。

杜甫忧患意识的另一个方面是心忧民瘼。在关心民间疾苦、同情百姓哀乐方面，中国古代诗人没有哪个能与杜甫相比的。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特别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和命运。在唐玄宗的盛唐时期就写出了像《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和《秋雨叹》等同情黎民百姓的作品。对“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普通士兵表示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对于“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的贫民和农夫的艰难生活状况时刻挂在心头。安史之乱后，杜甫更进一步深入民间，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写出了大量前人未曾写过的同情人民的诗篇，成为贫苦大众的代言人。

杜甫还是一个勇于批判的现实主义诗人。他认识到“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对那些人民苦难的制造者，必须对其展开揭露和批判，并应以清除。他不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人民苦难的主要制造者安史叛军，而且对官府横征暴敛的残暴行为以及贪污腐化的丑行也决不放过。安禄山、史思明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给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杜甫对他们痛恨至极：“禄山作逆降天诛”（《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一），将他们称作“逆胡”、“胡孽”、“胡虏”，要人天共诛之。对于官军、官府和地方军阀对人民的迫害和暴行，杜甫也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其三）他们横征暴敛，不但残酷地搜刮百姓以至于“杼轴茅茨空”（《岁晏行》），就连无儿无食的寡妇也不肯放过：“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还有那些“横索钱”的贪官污吏们，他们想尽办法来敲诈盘剥、中饱私囊的丑行都为杜甫所谴责和批判。

杜甫不仅在思想上忧国忧民，他还将孔子的仁爱思想，自觉地付诸实践，并且将自己的仁爱推及于人，甚至于推及于物，将儒家的仁爱理念、忠恕之道和恻隐之心自觉付诸实践，形成了他伟大的人格。杜甫将儒家的道德人格贯彻自己的一生。在做官时，他是一个敢于谏诤的忠良之臣；在去职为民时，他不忘国忧和民瘼，是一个为天下百姓安身立命呼吁奔走的志士；作为人子，他是克守先人遗志、遵从父辈教导、“不敢违仁”的好子孙；作为人夫，他是一个体恤妻子和家庭的好丈夫；作为人父，他是一个慈祥尽心的好父亲；作为兄弟，他是一个时刻都在挂记关心兄妹的好兄弟；作为朋友，他是一个忠于友谊的良朋好友；为人做事时，他又是一个先人后己、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仁人和长者。他的伟大人格，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可堪效仿的榜样。

杜甫虽然身遭困苦流离，但他是一个正视苦难而心怀理想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理想就是构建一个君臣同心、朝野一致、四海统一、和平安定的和谐社会。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曾不止一次对“贞观之治”的“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诸葛庙》）、“会取君臣合”（《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朝野欢呼同”、“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往在》）的君臣一体、上下同心的社会表示向往。因他一生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生活在盛唐时代，因此，唐玄宗“开元之治”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的太平盛世，是他曾经经历过的如今又十分向往的安定和谐的太平盛世。正是这个和谐社会的理想，才是支撑和鼓舞他战胜痛苦、度过苦难的精神动力，从而使他在苦难中执著、顽强而不沦落于颓唐。这正是他与同时代的大历十才子悲观、失望和精神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所不同的地方。

三

杜甫对诗歌创作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及对诗歌文化品位的执著追求，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继承与发扬的。杜甫一生从事诗歌创作，天宝之前就作了一千多首诗，但这些诗大多数都失传了。他给我们留下的1458首诗，多是安史之乱以后所作，他的诗大部分都是人口称颂的精品。杜甫是一个集大成的诗人，诸体兼善。他的五、七言古体诗，主要用来咏怀和叙事。如《丽人行》、《兵车行》、《洗兵马》、《悲青坂》、《悲陈陶》和“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都是用古体诗来表现的。他的咏怀诗，尤其是那些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夹叙夹议的长篇咏怀诗以及《八哀》诗、《忆昔》、《遣怀》、《壮游》等带有传记、自传或叙

事性内容的诗，大都是用五、七言古体诗来完成的。而那些抒情性较强的或写景的诗，则多是用五、七律写成的。他的五言排律，多是投赠之作，因为此类诗，最能表现作者驾驭诗律和对仗的艺术技巧，显示诗人运用典故的文化修养和才情。他的绝句，则一反盛唐诗人标举风神的传统，任意遣兴，内容无所不可入，极大地扩展了绝句所表现的内容和功能，如以生活琐事入诗，以绝句代札索物，以绝句议论时事，以绝句论诗等。在绝句的形式上也有创新，常用写律诗的方法来写绝句，或前二句对仗，或后二句对仗，或四句全对仗等。这可能是受到作律诗的影响，因他的绝句绝大多数都是他在入蜀以后写成的，而此时期正是杜甫创作律诗的高潮时期。他的五、七言律诗，大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传世之作。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是非常认真的，经常是“新诗改罢自长吟”。晚年对诗歌更是仔细推敲，字斟句酌，“晚节渐于诗律细”，力求使诗歌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最佳境界，初盛唐诗人所创制发展的律诗，终于在杜甫的手中得到了完善和定型，从此，律诗极为盛行，成为一种主要诗体，其数量占了中晚唐诗的大半。杜甫还对律诗的内容做了巨大的开拓和扩展。为了扩展五、七言律诗的内容，杜甫采取了用五律联章或七律联章的方式，来加大律诗的内容含量。如他的名作五律《秦州杂诗二十首》、七律《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都是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组诗。他的律诗标志着唐诗的成熟，是诗歌形式和声律的完美结合，最能代表唐诗的成就和特色。在乐府诗方面，杜甫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杜甫之前的乐府诗，绝大多数都是沿袭旧题，或者说是旧瓶装新酒，而杜甫的新题乐府可谓是瓶酒俱新，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体乐府诗，这是一种能够迅速反映社会现实的新诗体，是对诗歌体裁的一种创造性的发展，为元白等人的新乐府运动所继承发扬。他的诗歌是时空并驭的，既有阔大的空间容量，同时又具有深远的历史纵深度。

如“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等，都是一句写空间，一句写时间，从空间的纵横度和历史的纵深度两个方面写出事物的立体感。又如“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以乾坤和洞庭湖的阔大与诗人孤独一身的微小相比，形象反差极大，形成鲜明对比，可谓是沉郁顿挫至极，体现了诗人高超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杜甫使中国的古典诗歌达到了一种臻于完美的境地，其诗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之作。

四

在中国文化史上，杜甫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是儒学思想的实践者。这一点越来越成了当今学者的共识。在匡亚明主编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丛书》中，杜甫就是作为一位思想家名列其中的。在唐代，他是早在韩愈之前的儒学复兴的先行者，他博大的仁者胸怀以及先秦儒家“仁者爱人”和“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其诗歌里贯彻始终。他不像一些思想家坐而论道，而是对儒学精神身体力行，是儒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儒家“仁”的思想成为有血有肉、有鲜活生命的实践品格。他不仅是一个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还是一个对全人类命运及一切生命都极为关怀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如他反对战争中滥杀无辜，对其他民族也同样怀有一颗仁爱之心：“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他对人世间其他有生命的东西，也怀有恻隐之心：“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的思想和品德已超越了儒家固有的宗法思想的藩篱，从而具有更为宽宏的关怀人类命运和众生命运的博大仁者胸怀，故杜甫的思想和人格，对后代的思想

家、政治家、爱国志士以至于普通的读书人，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宋代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生最佩服的诗人就是杜甫。他极力称赞杜甫说：“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南宋的大诗人陆游也极力称赞杜甫的思想和为人，把他看做是一个能“开太宗业”致君尧舜的大儒和政治家，他说杜甫道：“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读杜诗》）南宋的理学宗师朱熹，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并称为古今以来“光明正大”品德高尚的“五君子”（见《王梅溪文集序》）。南宋末的爱国主义志士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后囚在大都，他曾在狱中集杜诗二百余首，用杜甫精神来激励自己的爱国情操，并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读杜诗·自序》）近代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鲁迅先生极力推崇陶渊明、李白和杜甫，但他说：“我总觉得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这也是时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连郭沫若也曾盛称杜甫为“诗中圣哲”。

至于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成就，中唐以后更为人们所极力称颂。他一向是与李白并称的，中国诗人的代表，历以李、杜称首。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称颂杜甫与李白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但杜甫的实际地位，在中唐以后，却越来越高。中唐著名诗人元稹极称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宋代大诗人苏轼说：“古代诗人众矣，而杜子美独为首。”（《王定国诗集序》）宋代诗人与著名词人秦观称杜甫为“集大成”（《韩愈论》）的诗人，宋代江西诗派奉杜甫为